

山西省金融支持精准扶贫成效研究

柴菁敏¹, 柴磊², 田东伶¹

(1. 运城学院 经济管理系, 山西 运城 044000; 2. 北京链家置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运营部, 北京 100010)

摘要:从山西省精准扶贫工作的现状出发,探讨金融支持精准扶贫取得的成就和不足。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取山西省 11 个地级市的相关数据,运用 DEA2.1 软件从金融投入产出的角度研究金融支持精准扶贫的效率问题;运用 Eviews7.2 软件以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被解释变量,探究金融对精准扶贫的贡献问题。最后从加大金融产品创新、把控信贷风险、完善金融扶贫法律等方面为山西省金融更好地支持精准扶贫提出建议。

关键词:金融支持;精准扶贫;山西省;扶贫成效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807(2021)08-0203-06

金融扶贫是改变传统“输血式”扶贫的重要举措,在精准扶贫工作中作用重大^[1]。山西省是煤炭资源大省,经过多年的煤炭开采造成全省生态环境退化,经济结构单一,贫困现状加剧。近年来,国家推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减少相关产能供给,优化相关产业结构,促使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创造出众多就业岗位。山西省政府联合多方机构,大力支持金融扶贫,效果显著^[2]。因此,研究山西省金融支持精准扶贫成效问题,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和现实意义。

1 山西省精准扶贫工作现状

山西省是全国扶贫开发工作重点省份,共包含 36 个国家级贫困县,22 个省级贫困县。自 2012 年十八大召开以来,山西省始终致力于脱贫攻坚前沿,围绕特色产业扶贫、基础政策完善扶贫、培训就业扶贫、社会保障兜底、异地搬迁扶贫、基本公共服务提升、社会力量帮扶、生态补偿脱贫、“一县一策”等政策拉开精准扶贫的大幕^[3]。截至 2020 年底,山西省在扶贫方面取得丰硕成果。

1.1 贫困人口数量不断下降

近几年,山西省依靠相关扶贫政策,向全省贫困村下派第一书记,在扶贫专项资金的撬动下,借助金融支持产业扶贫、小额信贷等方式,脱贫成效显著,贫困发生率逐年降低。国家 2014 年建档立卡时,全省累计筛选出 7 993 个贫困村,329 万农村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为 13.6%。经过多年精准扶贫工作的努力,山西省贫困人口数量和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截至 2020 年 6 月底,山西省全省 58 个贫困县和 7 993 个贫困村全部退出贫困序列,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部达到脱贫标准,贫困发生率降至 0。

1.2 贫困人口收入逐年增加

表 1 显示,2014—2019 年山西省贫困地区居民收入增长显著,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由 3 379 元增长为 3 523 元,与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由 11 108 元增长为 15 647 元,反映出城乡贫富差距问题突出,且呈愈演愈烈趋势。

表 1 2014—2019 年山西省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和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单位:元

分类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贫困地区	5 430	6 078	6 623	7 330	8 249	9 379
农村居民	8 809	9 454	10 082	10 788	11 750	12 902
全省居民	16 538	17 854	19 049	20 420	21 990	25 026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收稿日期:2021-04-08

基金项目: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2020W158)。

作者简介:柴菁敏(1986—),女,山西运城人,运城学院经济管理系,讲师,经济学硕士,研究方向为区域金融政策;柴磊(1998—),男,山西运城人,北京链家置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经纪人,经济学学士,研究方向为金融支持精准扶贫;田东伶(1983—),女,山西运城人,运城学院经济管理系,讲师,管理学硕士,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学。

随着各项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山西省贫困地区居民的收入结构呈现出多元化趋势。表 2 显示,2014—2019 年山西省贫困地区居民工资性收入逐年增加,依然是贫困地区居民收入的主体,但其所占比例呈现出下降趋势。工资性收入

的增加主要受惠于山西省就业扶贫政策的大力推广,通过企业带头、创建合作社、就业培训、转移劳动力等方式增加贫困地区就业岗位,除此之外,易地搬迁政策的实施也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就业机会。

表 2 2014—2019 年山西省贫困地区居民收入结构

年份	工资性收入		经营净收入		财产净收入		转移净收入	
	金额/元	占比/%	金额/元	占比/%	金额/元	占比/%	金额/元	占比/%
2014	2 303	42.40	1 844	33.95	71	1.31	1 213	22.33
2015	2 663	43.81	2 003	32.96	76	1.25	1 336	21.98
2016	2 812	42.46	2 117	31.96	80	1.21	1 614	24.37
2017	2 925	39.91	2 246	30.64	83	1.13	2 076	28.32
2018	3 156	38.26	2 399	29.08	98	1.19	2 596	31.47
2019	3 575	38.12	2 544	27.12	102	1.09	3 158	33.67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经营性收入也在逐年增加,说明山西省积极发展特色农业,调整农产品供给侧结构,经济效益显著。与此同时,山西省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为贫困地区的发展提供了诸多机遇,乡村旅游、休闲、电商等行业收益明显。但经营性收入在贫困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中所占比例逐年下降,这主要是由于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快速增长。

由于贫困地区居民个人财产极少,通过财产增值、财产租赁等方式所获收入较少。财产性收入虽然占比少,所占比例也逐年下降,但绝对值依旧在缓慢增长。

转移净收入增长最快,主要得益于山西省提前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农业生产补贴等一批惠农政策。与此同时,山西省提高城乡低保标准,医疗、卫生、教育等社会保障服务兜底,农民补贴收入增长

显著。随着时间推移,转移性收入超过经营性收入在贫困地区居民收入居于次位。

1.3 贫困人口居民消费能力不断增强

随着贫困地区居民收入的逐年增加,消费支出也在不断增加。表 3 显示,2014—2019 年山西省贫困地区农民居民消费支出结构悄然变化。衣食住用等生活基本消费所占比例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随着居民教育理念的转变,教育文化支出逐年增加,所占比例呈现出增加的趋势;近年来移动手机和通信网络的快速普及推动交通通信支出逐年增加,在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逐年增加,但在 2019 年有所下降;随着医疗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和贫困地区居民健康意识的增强,医疗保健等生活服务消费支出也在逐年增加。贫困地区居民消费结构一步步优化,生活质量逐步提高。

表 3 2014—2019 年山西省贫困地区消费结构

年份	衣食住用		交通通信		教育文化		医疗保健		合计 金额/元
	金额/元	占比/%	金额/元	占比/%	金额/元	占比/%	金额/元	占比/%	
2014	3 652	71.89	477	9.39	502	9.88	449	8.84	5 080
2015	3 803	69.71	523	9.59	539	9.88	590	10.82	5 455
2016	4 012	68.69	566	9.69	646	11.06	617	10.56	5 841
2017	4 116	65.60	678	10.81	674	10.74	806	12.85	6 274
2018	4 419	63.07	837	11.95	783	11.18	967	13.80	7 006
2019	5 076	63.45	877	10.96	886	11.08	1 161	14.51	8 000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2 山西省金融支持精准扶贫现状

扶贫工作是民生重点工作,近年来国家多次发布相关文件支持金融扶贫。山西省是全国扶贫攻

坚主战场之一,多次多方面发布扶贫指导文件,召开多次会议对农村金融扶贫工作进行探讨和规划,并且取得丰硕成果。

2.1 信贷规模逐渐扩大,但金融产品结构单一

近年来,山西省金融扶贫规模进一步扩大。2016 年全年累计发放扶贫贷款 176.1 亿元;2017 年全年累计发放扶贫贷款 629.2 亿元;2018 年全省发放金融扶贫贷款 728.6 亿元,惠及全省 331 万贫困群众,其中包括建档立卡群众 134.1 万人。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积极发挥央行职能作用,指导全省各级银行加大货币政策力度。在原有扶贫贷款基础上,各商业银行增加贫困地区贷款额度,助力金融扶贫。

虽然金融支持精准扶贫使得山西省信贷规模不断扩大,但普通农户获得大额资金贷款难度较高。小额信贷是推广最为普遍的信贷产品,但在不少地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贷款门槛高、贷款难的问题依然存在^[4]。同时部分地区小额信贷已经达到滥用程度,扶贫工作人员优先推荐申请小额信贷,而小额信贷申请额度小、期限短,无法满足生产经营需要;与此同时小额信贷也并不是全部适用,建档立卡群众贫困原因多种多样,不同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又各不相同,盲目滥用小额信贷,没有与当地实际情况结合,不仅无法推出新的金融产品,也造成了金融资源的极大浪费。

2.2 贷款保障水平不断提高,但扶贫贷款逾期风险仍较高

为了解决信贷风险问题,山西省通过设立风险补偿金,开发扶贫保险产品降低金融机构放贷资金风险。2015 年山西省下拨 2.41 亿元风险补偿金,2017 年下拨 2.6 亿元,2018 年达到 2.76 亿元人民币。山西省银保监局在省扶贫办、省政府的联合帮助下,减免农业险相关保费,优化理赔流程,积极创新扶贫保险产品,完善信贷相关保险机制,鼓励引导保险公司积极参与贫困县扶贫工作,摸索出保险助推精准扶贫工作可推广的新模式。

虽然贷款保障机制在不断完善,但由于建档立卡群众普遍受教育程度低,自身信用保护意识不强,生产经营能力差,贷款逾期风险极高^[5]。贫困地区通信条件差,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对农户收入影响极大。农户一旦没有收入,不仅无法按时归还银行贷款,造成信用损失;对银行而言,由于贫困地区机制不完善,无法对农户做出责任追偿,农户会认为借银行钱还没有责任,继续借钱。银行不再愿意为贫困地区提供金融服务,贫困地区生活条件越来越差,贫困程度进一步恶化。

2.3 扶贫机制不断优化,但扶贫力度仍需加强

2014 年山西省依照国家文件指示成立全国首批金融扶贫试验示范区;2015 年全面启动金融富民扶贫工程;2017 年山西省成立金融扶贫专项领导小组,统领山西省扶贫办、省财政厅、省银保监会等机构金融扶贫相关工作,助力全省金融支持精准扶贫;2018 年全省实现扶贫特色示范服务站贫困县全覆盖,为贫困地区居民提供政策资讯、法律咨询、贷款服务资讯等相关服务。

金融支持精准扶贫是脱贫中的重要一环,当前的扶贫制度还不够健全,扶贫力度仍需加强^[6]。贫困地区交通便利程度尚不完善,金融机构在村镇一级建立扶贫工作站尚不全面,金融普及推广力度不够,部分贫困地区农户不愿选用扶贫贷款发展经济,仍以政府发放的救济金为主。部分贫困地区金融方面权利和义务划分那还不够精确,贫困地区资源整合尚未完成。金融支持精准扶贫虽然已经取得成效,但前途道路依旧崎岖。

2.4 因地制宜的创新型金融扶贫模式不断推出

在实践中,山西省探索出一系列全新的金融扶贫模式,并在全省范围内推广。

2.4.1 大同黄花 e 贷模式

2018 年大同市州区农行推出黄花 e 贷,具有手续简单、放款快、借贷利率优惠等优点,广受当地农民的好评。截至 2019 年底,该行累计发放贷款 4.3 亿元支持黄花相关产业,帮助 5 386 家黄花种植户,大力扶持永祥食品公司等黄花商户和黄花深加工企业,累计带动 3 800 多贫困户脱贫。对于黄花种植过程中的风险问题,该区政府采用政府出一部分、农户出一部分的方式,与当地几家保险公司协调,出台黄花价格保险和黄花自然灾害保险,极大地分化了农户风险,为当地农户脱贫致富保驾护航。

2.4.2 汾西县“1+2”金融扶贫模式

2016 年临汾市扶贫小组入驻汾西县,发现该地区光伏资源丰富,又有多年的肉鸡养殖基础。经过多次调研,扶贫组决定发展光伏产业,实行“1+2”扶贫模式,即 1 户贫困户,两种产业。在贫困户屋顶建立 1.68 kW 光伏发电,在当地发展肉鸡养殖产业。2018 年汾西县各商业银行为当地贫困户光伏产业累计发放 2.4 亿元贷款,每户每年光伏发电收入可达 2.8 万元;人民银行汾西支行带动当地金融机构累计发放 2.14 亿元,支持肉鸡养殖、双孢菇种植等特色产业发展,扶贫效果显著。2019 年,汾西县摘掉贫困县帽子。

2.4.3 隰县金融支持电商扶贫模式

山西省临汾市隰县是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这里光照足、温差大,种梨历史悠久。隰县政府借助电商红利,该县生产的“玉露香”果梨畅销全国。当地政府与当地金融机构合作,创新推出“果乐富”“梨商通”“易商通”等系列信贷产品,累计投放梨果贷款 3.85 亿元,助力发展梨果总面积达到 38 万亩。隰县农商银行着力打造电子商务环境:在午城镇、下李乡等 10 个村镇建立农村电商服务站;向隰县好乐佳电子商务公司、隰县北纬三十六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发放 1 250 万元贷款;推出低利率的“供应链联盟电商贷”产品,利率仅为 5.8%,全力支持隰县电子商务发展。2019 年,隰县摘掉贫困县的帽子。

3 山西省金融支持精准扶贫效率和贡献测度

选用山西省 11 个地级市 2014—2018 年相关数据,运用 DEA2.1 软件和 Eviews7.2 软件分别分析金融支持精准扶贫的效率问题和贡献问题。

3.1 山西省金融支持精准扶贫综合效率实证分析

3.1.1 研究方法

数据包络分析法是研究投入产出相对效率的一种研究方法,通过数据规划模型来计算决策单元之间的相对效率。不需要设置权重假设,操作简单,可以排除众多主观因素,具有很强的客观性。

为了研究山西省 11 个地级市金融扶贫效率,以山西省 11 个地级市为决策单元。扶贫标准以实际收入为标准进行判别,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衡量农村居民收入情况;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衡量城镇居民收入情况;选用人均 GDP 衡量经济增长水平;用人均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表示金融的渗透性和居民参与金融的程度;人均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表示金融对居民的支持程度;金融单位数量表示金融服务的普及程度。投入产出参数见表 4。

表 4 山西省金融扶贫投入产出指标

分类	变量名称	变量解释
投入指标	人均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金融服务支持性
	人均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	金融服务参与性
	金融机构单位数量	金融服务普及度
产出指标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收入情况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镇居民收入情况
	人均 GDP	经济发展水平

3.1.2 山西省各地级市金融支持精准扶贫综合效率测度

运用 DEA2.1 软件计算山西省各地级市 2014—2018 年金融扶贫的综合效率值,结果见表 5。

表 5 山西省 2014—2018 年综合技术效率

地级市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太原	1	1	0.970	1	1
大同	0.785	0.701	0.698	0.667	0.747
阳泉	1	1	1	1	1
长治	0.908	0.983	1	0.978	0.949
晋城	0.937	0.948	0.926	0.996	0.970
朔州	1	1	1	1	1
晋中	0.874	0.916	0.893	0.864	0.864
运城	1	1	1	1	1
忻州	0.803	0.775	0.757	0.819	0.804
临汾	0.890	0.888	0.853	0.852	0.863
吕梁	0.862	0.840	0.824	0.941	0.911
均值	0.914	0.914	0.902	0.920	0.919

从分析效率来看,阳泉、朔州、运城综合效率一直保持在 1。说明在这 3 个地级市投入要素转化为产出指标的效率更高。太原市综合效率除了 2016 年,其余年份也均保持在 1,人均贷款余额、人均存款余额、金融机构单位数量都高效率地转化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 GDP。

在数据统计期限内,超过半数的地级市,包括大同、晋城、晋中、忻州、临汾、吕梁综合效率值小于 1,说明在这些地级市一直存在过多投入且未能完全转化为产出,要求政府加强管理和技术创新,提高金融资源利用程度。

大同市综合效率在山西省最低,这与大同近几年产业结构调整有关,导致其效率不高,但其综合技术效率起点低,随着经济转型发展,金融帮扶力度逐渐加大,扶贫效率逐渐提高;晋城、长治综合效率在这几个地级市中最高,接近最优状态,相关政府应该继续加强管理,提高效率;晋中、临汾两市综合技术效率接近,提升空间大;忻州综合技术效率也偏低。

研究期内长治市综合效率逐渐提高并达到最优,之后又逐渐下降,效率由有效转化为无效,金融扶贫效率递减,主要原因是长治市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经济力度不足,金融带动扶贫效果减弱。

吕梁市综合效率在 5 年里逐步提高,并达到最

优。吕梁市贫困县较多,经济基础薄弱,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开展,金融扶贫效果显著,投入转化为产出效率高。

总体来看,山西省综合效率在 0.91~0.92 浮动,大部分地区未能达到最优状态,且效率较低,这与山西省较为贫困的经济现状相对应,侧面印证了结论的准确性。

3.2 山西省金融对精准扶贫的贡献实证分析

关于金融对精准扶贫的贡献研究,选用计量经济学中的 Eviews7.2 软件分析,其实用性高,简洁高效。通过观察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相关程度,分析其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

3.2.1 变量选取和模型建立

贫困的评定标准是以居民的收入水平来评定的,选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CRI)衡量贫困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由于贫困地区农户贷款数据获取困难,以人均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RLB)代替贫困地区居民贷款水平,衡量金融对精准扶贫的支持力度;用人均一般公共财政支出(PFE)衡量财政对精准扶贫的支持;以人均 GDP(GDP)表示经济发展水平对贫困地区收入增长的贡献;以公路里程数(HM)表示交通等基础设施完善对精准扶贫的贡献。模型变量选取见表 6。为了消除异方差对分析结果的影响,将上述各变量数据以万为单位取对数并据此建立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为

$$CRI_{it} = \beta_0 + \beta_1 RLB_{it} + \beta_2 PFE_{it} + \beta_3 GDP_{it} + \beta_4 HM_{it} + \epsilon_{it}$$
 (1)

式中: i 表示地级市个数; t 表示年份; β_0 表示常数项系数; β_1 、 β_2 、 β_3 、 β_4 表示各解释变量系数; ϵ_{it} 表示残差项。

表 6 山西省金融扶贫贡献模型变量

变量分类	变量名称	变量意义
被解释变量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CRI)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解释变量	人均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RLB)	金融支持
	人均一般公共财政支出(PFE)	财政支持
	人均 GDP(GDP)	经济发展水平
	公路里程数(HM)	交通便利程度

3.2.2 山西省金融对精准扶贫的贡献测度

选用山西省 11 市 2014—2018 年相关数据,分析金融对山西省精准扶贫的贡献。分析结果见表 7。

表 7 山西省金融扶贫贡献模型测度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t 统计量	P 值
常数项	-0.827 3	0.162 4	-5.093 5	0.000 0
RLB	0.528 8	0.085 8	6.163 0	0.000 0
PFE	0.051 4	0.086 9	0.591 8	0.557 3
GDP	0.155 5	0.093 7	1.659 8	0.104 8
HM	0.566 9	0.571 2	0.992 4	0.327 0
Adj- R^2	0.981 0			
F-statistic	200.203 7			

在多元回归模型中, P 值小于 0.05 则影响显著,大于 0.05 则影响效果不显著;系数为正则呈正相关,为负呈负相关;模型回归的拟合优度越接近于 1,表明自变量很好地解释了因变量。本模型中 F 检验值为 200.2,拟合优度值为 0.98,检验效果显著,说明所建模型中自变量能对因变量进行很好的解释。

表 7 的实证结果显示: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P 值为 0,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影响显著,模型参数 β_1 为 0.528 8,呈正相关性,说明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影响极大,贡献极高;人均一般公共财政支出 P 值为 0.557 3,大于 0.05,其相关系数 β_2 为 0.051 4,呈现正相关,说明单纯的政府财政支持对精准扶贫有帮助,但贡献不高;人均 GDP 的 P 值为 0.104 8,相关系数 β_3 为 0.155 5,呈正相关,表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精准扶贫起促进作用;公路里程数的 P 值为 0.327 0,相关系数 β_4 为 0.566 9,呈现正相关,说明交通便利程度对精准扶贫起到促进作用。

4 山西省金融支持精准扶贫的建议

结合山西省金融支持精准扶贫的现状和实证分析的结果,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提高山西省金融支持精准扶贫成效的建议。

4.1 加大金融产品创新力度

当前流行的金融产品结构单一,主要以小额信贷为主,未能满足广大贫困地区群众的贷款需求。在开展金融扶贫工作时,金融机构应该多关注国家对于贫困地区的其他方面政策,例如目前在农村地区实施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新政策。尝试对贷款抵押物进行创新,扩大担保品的范围,不仅仅是经济资产,包括贫困户的土地、房屋、林木等实物资产进行抵押,设计推广因地制宜的金融产品。这样做不但降低了贷款成本,也提高了金融的可持续性发展^[7]。

4.2 加强风险防控和风险保障

建档立卡地区之所以难以获得金融资源的支持,关键在于该地区放贷风险高、收款难度大。政府应该加大金融政策普及程度。进一步加大风险保证金的投入,撬动更多金融资源^[8]。省银监局与贫困地区政府加强合作,推广相关保险业务,为农户提供保障,促进贫困地区尽快脱贫致富。

4.3 完善金融扶贫法律法规

贫困地区居民相比普通地区,文化水平不高,个人信用意识差。政府应该加强金融领域法制建设,完善金融机构债务追责制度。推广建立村级金融综合服务站,既能宣传金融法律知识,获取最新金融讯息,又能强化个人信用理念,培养良好的社会公德。金融机构依法发放扶贫贷款,建档立卡群众依法获得扶贫资金,按期还本付息,从而政府、贫困群众、金融机构获得三方共赢^[9]。

5 结论

通过对山西省贫困人口状况进行统计,分析贫困地区居民收入支出情况,对山西省金融支持精准扶贫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山西省金融扶贫成效显著但又有不足,信贷规模逐步扩大,但金融产品结构单一;信贷保障水平逐步提高,但预期风险仍然较高;扶贫机制不断完善,但仍需完善。通过对 11 个地级市分别进行效率测度和贡献测度,发现山西省金融支持精准扶贫整体效率高,扶贫贷款成效显著,居民收入增长快。扶贫贷款对于精准扶贫贡献高,相关性强,居民收入增长显著。政府一般公共

财政支出、经济发展水平、交通便利程度对居民收入均有促进作用。政府应该继续加大贷款扶贫力度,提高信贷保障水平,完善扶贫机制,推动金融扶贫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当前金融支持精准扶贫虽然成效显著但尚有缺陷,仍然需要继续完善。由于个人收集资料能力有限,部分数据获取困难,对于结论支持力度不够。山西省精准扶贫其他方面仍有待研究。

参考文献

[1] 孙波. 浅谈普惠金融助力精准扶贫的模式与路径——以银行、保险、期货为例[J]. 商业经济, 2020(3): 174—175.

[2] 李泽平. 贫困地区金融助推精准扶贫工作研究——以山西省娄烦县为例[J]. 中国合作经济, 2020(1): 52—54.

[3] 郝卫红. 山西省精准扶贫实践、问题及对策研究[J]. 经济师, 2019(3): 150—152.

[4] 白志红. 普惠金融助推农村金融扶贫发展的策略研究——以山西省为例[J]. 辽宁经济, 2019(6): 49—51.

[5] 赵建军. 给贫困农户一个脱贫支点——山西省金融富民扶贫工程实施方案解析[J]. 农产品加工, 2014(10): 22—23.

[6] 李宇. 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金融机构业务模式创新——以山西省为例[J]. 银行家, 2017(7): 111—112.

[7] 莫姣姣. 普惠金融对金融扶贫的作用探析[J]. 中国市场, 2020(8): 40—41.

[8] 马腾跃, 陈聪, 郭晓东. 聚焦难中之难 攻克深度贫困——人民银行太原中支副行长杜斌讲述山西金融扶贫故事[J]. 中国金融家, 2017(9): 69—71.

[9] 路璇. 发挥政策金融扶贫作用全力支持精准扶贫[J]. 财富时代, 2020(2): 86.

Research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Financial Support for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Shanxi Province

CHAI Jing-min¹, CHAI Lei², TIAN Dong-ling¹

(1.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Yuncheng University, Yuncheng Shanxi 044000, China;
2. Operation Department, Beijing Lianjia Real Estate Brokerage Co., Ltd., Beijing 10001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Shanxi Province, discusses the achievements and shortcomings of financial support. Under the premise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the relevant data of 11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Shanxi Province, DEA2.1 and Eviews 7.2 software was used to study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upport for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nancial input and output. Disposable income is the explained variable, and explore the contribution of finance to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Finally, throw out suggestions from innovating financial products, controlling credit risks, perfecting laws on finan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for financial better supports targeted poverty reduction in Shanxi province.

Key words: financial support; targeted poverty reduction; Shanxi Province; poverty alleviation